

## 住房保障制度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

——基于公租房准入条件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

王诗勇 万广华 孙伟增 王洪卫\*

**内容提要** 改善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和提升其就业质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本文基于公租房准入条件的模糊断点回归方法，使用 2016 年和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考察了公租房政策中的租赁保障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公租房政策显著缓解了流动人口的超时劳动，超时劳动概率和超时劳动程度都明显下降，但并未改变流动人口的迁出预期；公租房政策对受教育水平较低、年轻和省内流动等群组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公租房政策尚未带来“福利陷阱”难题，家庭补偿性收入提高是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得以提升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深入理解住房保障制度的稳就业作用，以及优化保障性住房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公租房 就业质量 迁移预期

###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跨区域流动规模持续扩大。据统计，以农民工为

\* 王诗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shiy\_walker@163.sufe.edu.cn；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guanghuawan@yahoo.com；孙伟增（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sunweizeng@gmail.com；王洪卫，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wangjue@mail.sufe.edu.cn。作者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23JJD790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903210、72274228、72174115）和上海财经大学 2022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CXJJ-2022-347）的资助。

主的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76亿人，已经占总人口的26.6%<sup>①</sup>。展望未来，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科技的快速进步，决定了中国的流动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万广华、张琰，2021）。源源不断、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促进了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发展（叶文平等，2018），是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驱动力。

然而，囿于资源禀赋不足和户籍限制等原因，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户籍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特别是在高房价的影响下，流动人口的居住成本和生活压力持续增加，健康状况呈现明显恶化趋势（米松华等，2016），出现了广受关注的过度劳动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小时，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劳动力占比为40.8%，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劳动力占比更是高达85.4%<sup>②</sup>。普遍存在的超时劳动，反映出劳动者低质量的就业状态（凌珑，2022；诸萍，2021），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而且还使其工作热情、专业能力和创造力在超时劳动中持续消耗，降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边际贡献。因此，控制劳动时间、缓解过度劳动也成为国家重视就业保障的重要一环<sup>③</sup>。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不但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所在。现有文献主要从房价、住房供给、经济增长等视角分析了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效果（邹旭等，2021；DiPasquale & Murray，2017），但关于住房保障制度对外来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基本缺失。因此，本文以流动人口超时劳动为研究对象，聚焦当前国家重点推进的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制度设计，实证分析住房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超时劳动的影响及其机制。为解决样本选择性问题，本文基于公租

① 参见 [https://www.stats.gov.cn/xgk/jd/sjjd2020/202210/t20221010\\_1889061.html?eqid=b04b197e000c60c800000066493d5e0](https://www.stats.gov.cn/xgk/jd/sjjd2020/202210/t20221010_1889061.html?eqid=b04b197e000c60c800000066493d5e0)。

② 参见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74.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74.html)。

③ 国务院2015年发布《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强调要切实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完善并落实国家关于职工工作时间、全国年节及纪念日假期、带薪年假等规定，规范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审批管理，督促企业依法安排职工休息休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要全面落实劳动工时制度。2021年6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进一步明确工时及加班工资法律适用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超时加班典型案例》，切实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质效，及时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行为，有效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及劳动报酬权。

房准入条件中对家庭收入门槛的限制,采用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FRD)识别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包括:第一,公租房政策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的超时劳动概率和超时劳动强度,尤其是对受教育水平低、年轻和省内流动的受保障群体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二,公租房政策没有降低流动人口的迁出预期,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没有产生广延边际效应;第三,公租房政策尚未导致“福利陷阱”问题,公租房货币补贴减少住房支出是就业质量得以提升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聚焦公租房政策的劳动供给效应,丰富了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评估文献;第二,在研究设计上,首次使用FRD方法评估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效果,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第三,从多个维度讨论了公租房对就业质量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住房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经济行为的影响;第四,本文的研究证实,公租房政策尚未导致西方国家过度保障所出现的“福利陷阱”问题,补充了相关文献并解答了社会、媒体和相关部门的疑虑。

## 二 政策背景与文献评述

### (一) 政策背景

截至目前,中国的租赁住房保障制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廉租房向公租房转型期(2007-2011年)。2007年,《廉租住房资金管理办法》和《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相继颁布,面向本地户籍无房群体的廉租房正式面世,旨在以货币补贴和实物补贴的方式给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住房保障。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加大投入,积极稳妥地推进公租房建设;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新就业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供应范围。

第二阶段是公租房快速发展期(2012-2020年)。2012年,《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发布,用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住房。2013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规定从2014年起,各地廉租房建设计划调整并入公租房建设计划。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通知》,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公租房。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公租房货币化，采取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举的保障方式，鼓励地方政府采取购买服务或 PPP 模式。

第三阶段是公租房向保障性租赁住房转型期（2021 年至今）。在外来人口快速涌入和地方财政支出有限的矛盾下，完全“政府主导”的公租房难以为继。2021 年，沿着公租房的保障逻辑，保障性租赁住房在 13 个重点城市开始试点推进。相比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承建主体调整为“政府支持、市场引导”模式，保障群体也从中低收入群体转向新市民和青年群体。

从制度设计上看，租赁住房保障的本质是基于收入再分配的逻辑为受保障群体提供货币补贴。尤其是面向流动人口的公租房，因其覆盖人群广泛、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灵活、操作透明度高、适于建立退出机制等特点，在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方面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邓红平、罗俊，2016）。基于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2017 年全国范围内获得公租房的流动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 7%；尽管获得公租房的流动人口比例较低，但按当年 2.4 亿流动人口计算，约有 1704 万流动人口获得了公租房，规模不容忽视<sup>①</sup>。

为实现精准保障，让住房困难群体真正享受住房福利，公租房政策设定了基本的收入条件以及必须具备的多维度、明确且严格的附加条件。其中，收入和住房条件是各个城市的共同要求，其他条件的设置与否则因地制宜，但基本内容都涉及了住房公积金、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的缴纳时长、人均住房面积等内容。

## （二）文献评述

### 1.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

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就业质量统计框架》，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可以分为就业安全和就业道德、就业收入与福利、工作时间以及工作与生活平衡、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社会对话、工作技能开发与培训、工作场所关系和工作动力共 7 个维度。针对不同维度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学者们从外部环境和个人因素等角度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原因。其中，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技术或工作环境等。比如，在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下，女性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会受到“生育代价”的负面影响（张樾樾、王利华，2017）。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能够从多个维度提升从业者的就业质量，表现在收入、工作时间、职业前景和满意度等方面（毛宇飞、胡文馨，2020）。就业的各类公共服务或福利保障也会提高从业者的就业质量，比如公共就业服务会通过就业信息渠道和

<sup>①</sup> 参见 <https://sdc-iesr.jnu.edu.cn/92/05/c16083a365061/page.psp>。

职业技能等路径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影响,且具有群体异质性特征(李礼连等,2022)。

就业质量也会受到劳动者个人、家庭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由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构成的人力资本能够显著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张世伟、张君凯,2022)。社会资本积累也会影响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如家庭社会网络的积累能够显著提升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和就业匹配(封世蓝等,2019)。此外,青年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也会受到子女随迁情况的影响,且具有就业身份、性别的差异性(诸萍,2021)。随着经济社会及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就业质量的范畴也不断拓宽,影响就业质量的因素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与流动人口务工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保障制度,可能对其就业质量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研究较为稀缺。

## 2. 住房保障制度与流动人口就业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住房保障制度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上产生的政策外部性(踪程,2020)。特别是在采取以货币补贴、实物保障或混合兜底保障的新举措下,住房保障制度有效解决了市场机制无法满足全体人民实现住有所居的不足,缓解了市场机制和居民福利之间的矛盾(Sinai & Waldfoegel, 2005)。其中,关于住房保障制度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维度进行了分析。

宏观层面的研究发现住房保障制度能够产生积极的就业创造效应。有学者使用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住房保障的经济拉动效应,发现保障性住房有效发挥了就业创造作用,保增长和惠民生的政策效果明显(陈立中、邓保同,2015)。也有学者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住房保障对受保障家庭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比如棚户区改造有助于为低收入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胡放之,2014)。还有研究表明,相比于租赁补贴,产权住房保障对居民家庭获得稳定就业、增加工资收入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是弱势群体提升经济社会地位的有效政策(崔光灿、廖雪婷,2018)。总体来说,保障房利好受保障群体的本质在于降低家庭住房成本,继而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劳动行为偏好(邓睿、郭东杰,2022)。

关于住房保障制度对个体劳动供给影响的微观机制,Moffitt (1992) 将其归纳为收入促进效应和收入替代效应。其中,收入促进效应表现为住房保障补贴提高了受保障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缓解了因流动性约束而形成的过度劳动行为。收入替代效应表现为住房保障对家庭其他收入的替代,即受保障家庭因获得更多补贴而降低劳动偏好。值得关注的是,两种效应都会降低受保障家庭通过就业增收的动机与积极性,减少劳动供给。Jacob & Ludwig (2012) 研究发现租赁住房补贴会产生福利依赖效应,降低受保障家庭的工作动机和增加收入的愿望(住房支出得以补贴),继而减少其就业和工资收入。

### 3. 住房保障制度与流动人口就业地选择

与流动人口就业息息相关的另一议题是就业地的选择。较高的收支剩余是外来劳动力选择就业地的前提，但在居高不下的住房压力下，外来劳动力不得不通过超时工作获得预期收入。如果该情况难以得到缓解，则会导致这部分群体“用脚投票”，选择净收入更高的其他城市，继而出现劳动力流失。

相关研究指出，房租负担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不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重要原因，解决好外来劳动力住房问题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流失（徐俊杰等，2022）。外来劳动力迁移也与住房问题密切相关，但很少有研究关注住房保障制度对劳动力迁移产生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住房成本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比如，张莉等（2017）指出，房价一方面降低了未来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作为居住成本压缩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两种作用对劳动力流动产生先吸引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此外，租金的上涨也会显著挤出外来劳动人口的非住房消费，继而对其社会融入产生抑制作用（孙伟增、张思思，2022）。也有文献间接讨论了住房保障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比如毛丰付和王建生（2016）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保障房建设对人口流入的影响，发现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助于促进外来人口流入。李勇辉等（2019）关注了保障房在缓解住房成本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保障房能够改变外来人口因城市高额住房成本而难以家庭化迁移的困境。类似的研究还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发现保障房对外来劳动人口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但该效应存在代际弱化趋势（祝仲坤，2020）。

总体来看，一方面，目前关于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丰富，但针对住房保障制度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讨论还非常少。另一方面，围绕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评估主要从宏观视角展开，基于微观视角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产权保障、棚户区改造或一般性租赁补贴，针对公租房政策效果的研究也较为缺乏，仅有的几篇相关研究囿于数据和研究设计方面的问题，难以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同时，现有文献中对于住房保障制度影响微观个体劳动供给的异质性讨论并不全面，尤其对低教育水平、年龄较大或跨省流动人口等面临更大住房困难群体的分析还有待完善。

## 三 研究设计

### （一）数据和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6年和2017年两期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该调查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遵照随机原则抽样、覆盖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流动人口调查,是以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调查项目。调查问卷中包含了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流动情况、经济水平、劳动就业、住房和健康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其中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支出、住房等相关信息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根据流入地和流动时间信息,本文选取了长春、苏州、南通、丽水、合肥、赣州、郑州、长沙、重庆、宝鸡、银川、石嘴山、固原和中卫共计 14 个样本城市,并将流动人口样本限定为流入时间在 1~2 年之间的家庭,即 2016 年调查中迁入时间为 2014 年和 2015 年,以及 2017 年调查中迁入时间为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家庭。

首先,关于样本城市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第一,样本城市对于社保、公积金缴纳时间的限定明确,有利于准确判断被调查的流动人口是否具有申请资格;第二,样本城市对于收入标准的设定清晰,有助于回归断点的识别;第三,城市样本中包含申请并获得公租房的家庭样本(处理组)。其次,限定样本的流入时间为 1~2 年之间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大部分城市对于社保或公积金缴纳的时间要求为至少 6 个月,因此迁入时间在一年以内的家庭很难达到公租房的申请要求;第二,由于无法得知家庭申请和获得公租房的具体时间,我们将迁入时间限定在两年以内可以尽量保证申请时间与调查时间相近,从而可以用调查时点家庭的收入去近似申请时的情况,确保断点设计的有效性。

此外,根据研究目的和实证设计需要,本文将样本限定在租房家庭,剔除了有房家庭样本;同时仅保留了以务工为目的的流动人口,剔除了随迁、拆迁、参军和学习等非就业目的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本文得到 14 个城市的 2659 个样本(处理组 433 个,控制组 2226 个),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和相对落后的城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二)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实证研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研究期内,样本城市租房流动人口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为 2377 元,最大值为 7500 元。其中,38% 的家庭满足当地的公租房申请条件,但只有 16% 获得了公租房的承租权。承租比例较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除了收入之外,公租房申请还要同时满足其他条件;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都会选择申请公租房。

关于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凌珑(2022)的研究方法,从劳动者工作时间维度定义就业质量。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本文根据劳动力每周的工作时长设定 3 个超时劳动指标:超过 44 小时定义为“超时劳动”,超过 50 小时定义为“过度超时劳动”,超过 60 小时定义为“重度超时劳动”。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构建了“超时劳动程度”“过度超时劳动程度”“重度超时劳动程度”3 个连续变量,其中超时劳动程度 = 周

工作时长/44，过度超时劳动程度 = 周工作时长/50，重度超时劳动程度 = 周工作时长/60。从表1的统计结果来看，外来劳动力的周工作小时平均为49.47小时，超过了44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长。其中，超时劳动的样本有1724个，占比64.84%；过度超时劳动的样本有1113个，占比41.86%；重度超时劳动的样本有600个，占比22.56%。此外，超时劳动程度、过度超时劳动程度和重度超时劳动程度的均值分别达到了1.12、0.99和0.82，反映出流动人口较为严重的低质量就业状况。

另外，考虑到劳动力流动问题，本文使用问卷中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问题，构建了劳动力的迁出预期指标用于反映潜在的劳动力流失情况。问卷中具体的问题设计为“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选项为：“是”“否”“没想好”）。我们将选择“否”或“没想好”的设定为有迁出预期，取值为1；选择“是”设定为没有迁出预期，取值为0。根据统计结果，有接近1/3的流动人口有迁出计划。从其他特征变量的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平均年龄为32岁，受教育年限平均为9年，61%为已婚，家庭人口数平均为2.57人，72%为省内流动，8%为党员，8%在国企工作，4%为少数民族。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overwork</i>	是否超时劳动	2659	0.65	0.48	0	1
<i>overwork level</i>	超时劳动程度	2659	1.12	0.31	0	2.27
<i>excessive overwork</i>	是否过度超时劳动	2659	0.42	0.49	0	1
<i>excessive level</i>	过度超时劳动程度	2659	0.99	0.27	0	1.98
<i>severe overwork</i>	是否重度超时劳动	2659	0.23	0.42	0	1
<i>severe level</i>	重度超时劳动程度	2659	0.82	0.23	0	1.65
<i>migration</i>	迁出本地的预期	1534	0.32	0.47	0	1
<i>income</i>	过去一年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2659	2376.73	1141.68	2000	7500
<i>D</i>	处理状态变量；1 = 获得公租房，0 = 未获得公租房	2659	0.16	0.37	0	1
<i>T</i>	收入是否满足公租房申请条件；1 = 是，0 = 否	2659	0.38	0.49	0	1
<i>age</i>	年龄	2659	32.47	9.77	16	69
<i>education</i>	受教育水平；0 ~ 6 依次表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2659	2.73	1.25	0	6
<i>marital status</i>	婚姻状况；1 = 结婚，0 = 其他	2659	0.61	0.49	0	1
<i>hhszie</i>	家庭人口数	2659	2.57	1.20	1	8
<i>migration type</i>	流动类型；1 = 省内流动，0 = 跨省流动	2659	0.72	0.45	0	1
<i>political status</i>	政治面貌；1 = 中共党员，0 = 其他	2659	0.08	0.27	0	1
<i>soe</i>	是否在国有企业工作；1 = 是，0 = 否	2659	0.08	0.28	0	1
<i>minority</i>	是否为少数民族；1 = 是，0 = 否	2659	0.04	0.19	0	1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三) 模型构建及相关检验

#### 1. 断点回归模型构建

基于公租房“同时包含多个条件并且单个条件有明确门槛”的制度设计，本文以收入门槛作为断点的选取依据，采用 FRD 方法评估公租房获取对受保障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和迁出预期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_i = \alpha + \beta D_i + f(I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  表示劳动力  $i$  的就业质量和迁出预期指标。 $D_i$  为处理变量，取值为 1 表示该家庭获得公租房，被纳入处理组<sup>①</sup>；反之，则被纳入控制组，表示未获得公租房。 $I_i$  为驱动变量，表示家庭人均收入与断点 ( $M$ ) 的差值。 $X_i$  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和城市的经济社会情况等。考虑到时间动态特征和宏观经济情况等影响，模型中还控制了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  表示随机误差项。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 2. 断点有效性检验

根据公租房政策的准入条件，需要对本文设定的回归断点进行有效性识别（如图 1 所示）。根据图示信息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结论：第一，样本获得公租房的概率在回归断点处发生了明显跳跃，且并非从 1 至 0 的变动，而是以概率的形式呈现；第二，公租房政策落实过程中确实体现出明显的指向性，当收入达到准入条件时，获得公租房的概率更大，且收入越低概率越高；第三，很少有收入超标但获得公租房的情况出现，说明本文使用的收入数据偏差不大。

#### 3. 识别条件检验

依据断点回归设计的可行性假设，使用该方法需遵循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不存在“内生组群”问题，即样本分组不存在自选择情况。理论上，居民家庭无法决定其是否具备公租房申请资格，原因在于以下三点：一是保障房政策是针对家庭进行的“精准”保障，家庭收入信息需经过严格审核，个体难以通过虚报收入获取住房保障资源；二是受访者自报误差的动机有限，由于 CMDS 的目的是全面了解流动人口的家庭经济社会情况，与公租房申请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被访家庭不会因其收入接近“断点”而选择虚报收入；三是本文研究对象大多是城市中的中低收入群体，他们谎报家庭收入的

①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人应当退回公共租赁住房”。因此，本文观察到的居住在公租房的家庭在理论上都是通过自己申请获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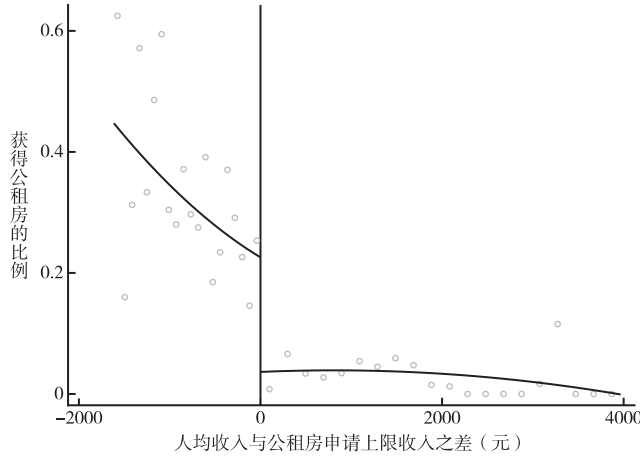


图1 人均收入与公租房获得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动机不足、可能性较低（张琪，2015）。针对这一必要条件，本文对断点两侧的收入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如图2所示，无论是直方图还是核密度图，在断点两侧都没有出现显著的跳跃，并且核密度图显示断点两侧的置信区间重叠区域较大，不存在人为干预驱动变量的情况。因此，本文设定的断点具备因果效应识别条件，即收入断点的跳跃可作为公租房获得与否的代理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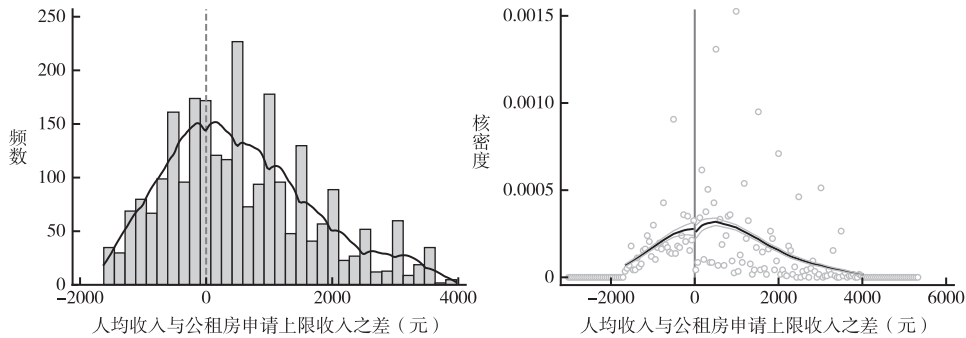


图2 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使用断点回归设计还需满足第二个假设：其他可能对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前置因素在断点处保持连续，即平衡性假设。反之，如果其他因素在断点附近出现跳跃，则很难把处理效应完全归因于公租房政策。对此，本文基于模型（1）采用三种标准误差

检验断点两侧前置变量的连续性，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这些前置变量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并未在断点处出现显著的跳跃，满足连续性假设。

表 2 平衡性检验结果

标准误处理	年龄	受教育水平	是否结婚	家庭人口数	是否省内流动	是否党员	是否在国有企业工作	是否为少数民族
常规标准误	-0.722 (9.438)	1.156 (1.243)	-0.419 (0.531)	-1.759 (1.183)	-0.514 (0.446)	0.294 (0.206)	0.166 (0.267)	-0.028 (0.142)
纠偏稳健标准误	2.261 (9.438)	1.062 (1.243)	-0.421 (0.531)	-1.111 (1.183)	-0.620 (0.446)	0.329 (0.206)	0.212 (0.267)	-0.049 (0.142)
稳健标准误	2.261 (11.426)	1.062 (1.506)	-0.421 (0.621)	-1.111 (1.413)	-0.620 (0.537)	0.329 (0.248)	0.212 (0.640)	-0.049 (0.16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四 实证结果

### （一）基准回归结果

#### 1. 公租房政策对流动人口超时劳动的影响

为了保证断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 Calonico et al. (2019) 提出的方法（简称 CCT）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 CCT 方法计算得到的最优带宽进行敏感性分析。表 3 的 Panel A 报告了公租房获得对流动人口超时劳动概率的影响结果。第 1 至第 3 列为采用双边相同带宽的结果，第 4 至第 6 列为采用双边不同带宽的结果。首先，第 1 列和第 4 列中系数估计值为 -0.63 至 -0.94，且至少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公租房政策使得受保障家庭超时劳动概率显著下降了约 63% ~ 94%；其次，第 2 列和第 5 列的结果显示，公租房政策使得受保障家庭过度超时劳动概率下降了 81% ~ 90%；相比之下，公租房政策对受保障家庭是否重度超时劳动的影响虽然也为负，但系数值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第 3 列和第 6 列）。图 3a - c 更为直观地展示了超时劳动概率随家庭收入的分布情况：是否超时劳动和是否过度超时劳动在断点前后出现了明显向上的跳跃，但是否重度超时劳动并未在断点处出现明显跳跃。图示结果与回归结果一致，即公租房政策有效缓解了流动人口的超时劳动和过度超时劳动，但对于重度超时劳动的影响不明显。

表3的Panel B报告了公租房获得影响流动人口超时劳动程度的回归结果。在所有模型中，核心系数的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说明公租房政策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的超时劳动程度。具体来说，与没有取得公租房的家庭相比，处理组家庭的超时劳动程度下降了0.30~0.54个单位，相当于在均值水平（1.12）基础上下降了27%~48%；过度超时劳动程度下降了0.27~0.47个单位，相当于均值水平（0.99）的27%~47%；重度超时劳动程度下降了0.22~0.40个单位，相当于均值水平（0.82）的27%~49%。整体来看，公租房对劳动力超时劳动程度的降低幅度在27%~49%之间。图3d-f更为直观地展示了超时劳动程度随家庭收入的分布情况，与回归结果一致，超时劳动程度在断点前后出现了明显向上的跳跃。

表3 公租房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

标准误处理	Panel A: 超时劳动概率					
	双边相同带宽			双边不同带宽		
	是否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超时劳动	是否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超时劳动
	(1)	(2)	(3)	(4)	(5)	(6)
常规标准误	-0.833 ** (0.354)	-0.832 * (0.495)	-0.065 (0.403)	-0.633 * (0.380)	-0.899 * (0.470)	-0.111 (0.319)
纠偏稳健标准误	-0.937 *** (0.354)	-0.838 * (0.495)	-0.037 (0.403)	-0.774 ** (0.380)	-0.814 * (0.470)	-0.200 (0.319)
稳健标准误	-0.937 ** (0.427)	-0.838 (0.620)	-0.037 (0.508)	-0.774 * (0.457)	-0.814 (0.554)	-0.200 (0.319)
标准误处理	Panel B: 超时劳动程度					
	双边相同带宽			双边不同带宽		
	超时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劳动程度	超时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劳动程度
	(1)	(2)	(3)	(4)	(5)	(6)
常规标准误	-0.539 ** (0.232)	-0.474 ** (0.204)	-0.395 ** (0.170)	-0.303 * (0.167)	-0.267 * (0.147)	-0.223 * (0.123)
纠偏稳健标准误	-0.538 ** (0.232)	-0.474 ** (0.204)	-0.395 ** (0.170)	-0.355 ** (0.167)	-0.313 ** (0.147)	-0.261 ** (0.123)
稳健标准误	-0.538 ** (0.245)	-0.474 ** (0.216)	-0.395 ** (0.180)	-0.355 * (0.192)	-0.313 * (0.169)	-0.261 * (0.141)

注：第1至第3列使用CCT标准计算的最优带宽，第4至第6列使用截断点附近的带宽；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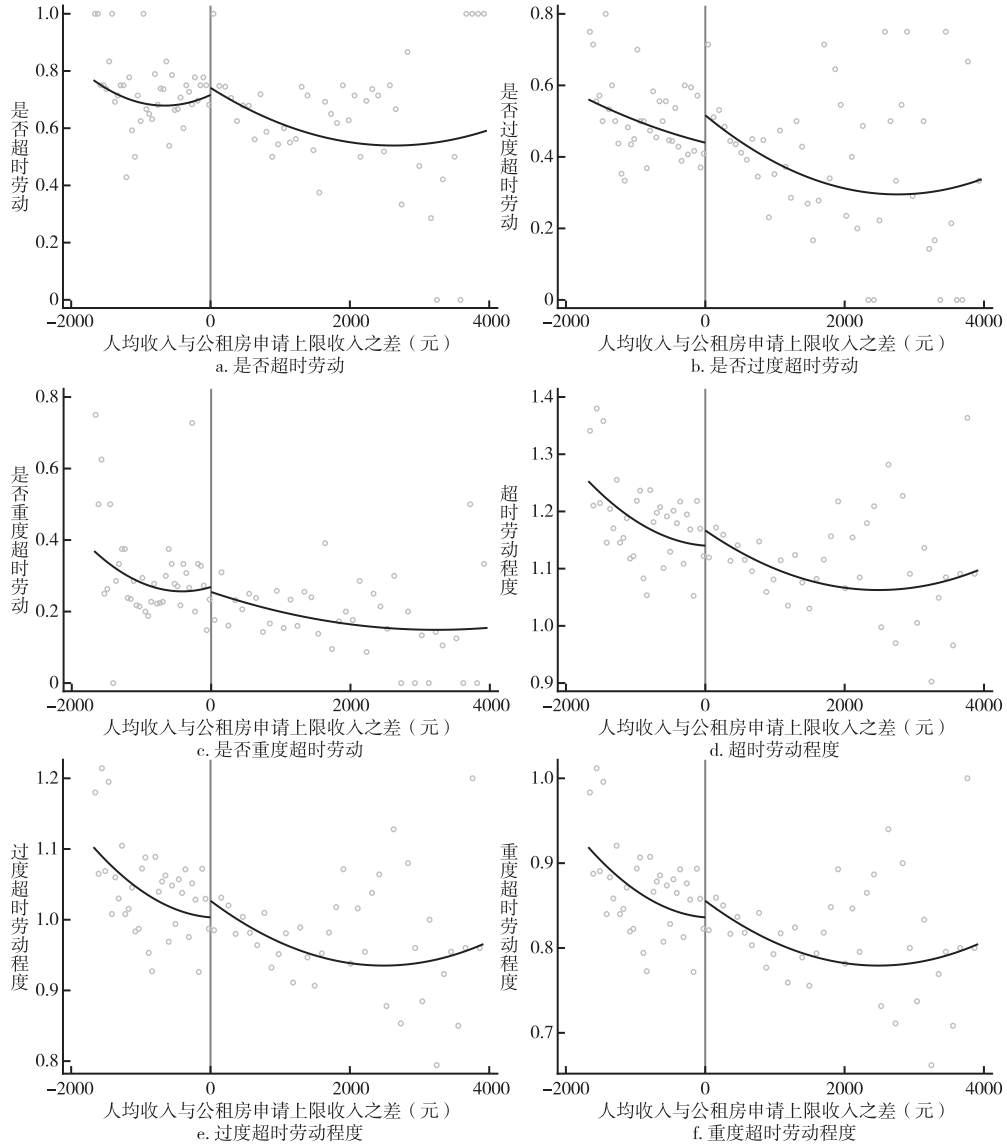


图3 公租房政策的集约边际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上述结果表明，公租房政策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的超时劳动供给，对于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显现。根据流动人口城市务工的“效益观”理论，流动人口自愿提供剩余劳动以获得预期收入，如果预期收入没有达成，则会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或牺牲

闲暇时间获得更多劳动报酬，就业增收的预期是流动人口延长工作时间的内在原因（卢文秀、吴方卫，2023）。公租房政策因其对流动人口提供“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的双重保障功能一定程度分摊了住房成本，使其通过劳动增收抵御住房成本上涨的风险得以降低。为了个人的健康资本积累和长期可持续劳动，劳动力选择降低当期的超时劳动供给以获得长期稳定的预期收入。

## 2. 公租房政策对流动人口迁出预期的影响

在租赁保障的货币补贴支持下，流动人口为提高劳动收入而被动延长劳动时长的非健康就业行为得以缓解，那么，该机制是否会刺激劳动力因住房成本而“流”向因获得住房补贴而“留”转变？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公租房获得对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以探讨城市劳动力流失问题中住房保障政策的作用。基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公租房政策对流动人口家庭迁出本地的预期具有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图4更为直观地展示了迁出预期指标随家庭收入的分布情况，与回归结果一致，流动人口迁出预期在断点前后并未出现明显的跳跃。

综合表3和表4的结果，尽管公租房政策所带来的补贴效应能够缓解流动人口的工作压力，但不足以成为流动人口长期留居的激励。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公租房政策的退出机制，受保障家庭在度过收入困境、不再符合公租房申请的收入条件后，须自动退出公租房。作为一个更长期的选择，在城市定居或迁出受到短期“收入冲击”的影响较小。第二，尽管公租房因其缓解住房成本的作用而降低了流动人口的过度劳动倾向，但这部分“货币补贴”相比长期居留所需的购房支出仍然很少。

表4 公租房对流动人口迁移预期的影响

标准误处理	双边相同带宽	双边不同带宽
常规标准误	-0.206 (0.380)	-0.053 (0.329)
纠偏稳健标准误	-0.274 (0.380)	-0.144 (0.329)
稳健标准误	-0.274 (0.495)	-0.144 (0.397)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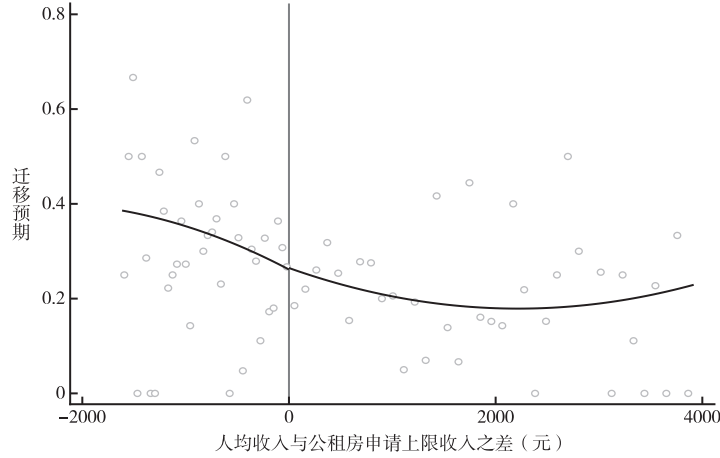


图 4 公租房政策的广延边际影响：迁移预期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二）稳健性检验

### 1. 敏感性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 0.75CCT、1.25CCT 和 1.5CCT 三个带宽来进行敏感性分析。表 5 报告了不同带宽下公租房政策对受保障家庭超时劳动的影响。所得结果与使用 CCT 标准最优带宽的估计结果相比没有出现明显差异，系数估计值的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仅存在数值大小差异，从而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不同带宽

带宽	标准误处理	是否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超时劳动	超时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劳动程度
0.75CCT	常规标准误	-0.476 (0.352)	-0.838 <sup>*</sup> (0.449)	-0.014 (0.364)	-0.574 <sup>**</sup> (0.242)	-0.505 <sup>**</sup> (0.213)	-0.421 <sup>**</sup> (0.177)
	纠偏稳健标准误	-0.934 <sup>***</sup> (0.352)	-0.929 <sup>**</sup> (0.449)	0.027 (0.364)	-0.855 <sup>***</sup> (0.242)	-0.752 <sup>***</sup> (0.213)	-0.627 <sup>***</sup> (0.177)
	稳健标准误	-0.934 <sup>*</sup> (0.534)	-0.929 (0.805)	0.027 (0.635)	-0.855 <sup>***</sup> (0.312)	-0.752 <sup>***</sup> (0.275)	-0.627 <sup>***</sup> (0.229)
1.25CCT	常规标准误	-0.682 <sup>*</sup> (0.377)	-0.721 (0.496)	0.020 (0.399)	-0.401 <sup>**</sup> (0.180)	-0.353 <sup>**</sup> (0.158)	-0.294 <sup>**</sup> (0.132)
	纠偏稳健标准误	-0.574 (0.377)	-0.606 (0.496)	0.315 (0.399)	-0.619 <sup>***</sup> (0.180)	-0.544 <sup>***</sup> (0.158)	-0.454 <sup>***</sup> (0.132)
	稳健标准误	-0.574 (0.458)	-0.606 (0.920)	0.315 (0.623)	-0.619 <sup>**</sup> (0.258)	-0.544 <sup>**</sup> (0.227)	-0.454 <sup>**</sup> (0.189)

续表

带宽	标准误处理	是否 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 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 超时劳动	超时 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 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 劳动程度
1.5CCT	常规标准误	-0.536 (0.365)	-0.694 (0.456)	0.054 (0.376)	-0.344 ** (0.173)	-0.303 ** (0.152)	-0.252 ** (0.127)
	纠偏 稳健标准误	-0.912 ** (0.365)	-0.647 (0.456)	0.326 (0.376)	-0.527 *** (0.173)	-0.464 *** (0.152)	-0.386 *** (0.127)
	稳健标准误	-0.912 * (0.535)	-0.647 (0.837)	0.326 (0.638)	-0.527 ** (0.257)	-0.464 ** (0.226)	-0.386 ** (0.189)

注：所有结果均使用截断点附近的相同带宽；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2. 安慰剂检验

进一步地，我们通过设定不同的收入断点来考察本文研究结论是否真正来自公租房的收入门槛设计。具体来说，我们在真实断点的基础上，分别增加或减少 200 元和 400 元，构造了 4 个新的断点，来考察被解释变量在“伪断点”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当使用其他收入作为断点时，公租房政策对于流动人口家庭超时劳动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本文之前的研究发现确实是在实际的收入门槛处发生的，也证实了本文基于收入准入门槛的断点回归设计的有效性。

表 6 安慰剂检验：不同断点

断点	标准误处理	是否 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 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 超时劳动	超时 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 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 劳动程度
-400	常规标准误	0.045 (0.485)	-0.427 (0.536)	0.100 (0.496)	-0.126 (0.288)	0.111 (0.253)	-0.092 (0.211)
	纠偏 稳健标准误	0.047 (0.485)	-0.473 (0.536)	-0.068 (0.496)	-0.149 (0.288)	0.131 (0.253)	-0.109 (0.211)
	稳健标准误	0.047 (0.582)	-0.473 (0.638)	-0.068 (0.620)	-0.149 (0.364)	0.131 (0.321)	-0.109 (0.267)
-200	常规标准误	0.078 (0.707)	-0.171 (0.698)	-0.206 (0.643)	0.291 (0.474)	0.256 (0.417)	0.213 (0.347)
	纠偏 稳健标准误	0.191 (0.707)	-0.052 (0.698)	-0.292 (0.643)	0.210 (0.474)	0.185 (0.417)	0.154 (0.347)
	稳健标准误	0.191 (0.871)	-0.052 (0.848)	-0.292 (0.781)	0.210 (0.547)	0.185 (0.481)	0.154 (0.401)



续表

断点	标准误处理	是否 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 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 超时劳动	超时 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 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 劳动程度
200	常规标准误	0.029 (0.791)	-0.522 (0.912)	-1.359 (0.872)	0.039 (0.517)	0.034 (0.455)	0.028 (0.379)
	纠偏 稳健标准误	0.022 (0.791)	-0.483 (0.912)	-1.366 (0.872)	-0.004 (0.517)	-0.003 (0.455)	-0.003 (0.379)
	稳健标准误	0.022 (0.903)	-0.483 (1.030)	-1.366 (0.976)	-0.004 (0.558)	-0.003 (0.491)	-0.003 (0.410)
	常规标准误	-0.554 (4.244)	-3.123 (8.406)	2.485 (4.987)	-0.946 (2.769)	-0.832 (2.437)	-0.694 (2.031)
400	纠偏 稳健标准误	2.008 (4.244)	-1.124 (8.406)	2.379 (4.987)	-1.558 (2.769)	-1.371 (2.437)	1.143 (2.031)
	稳健标准误	2.008 (5.085)	-1.124 (10.132)	2.379 (6.066)	-1.558 (3.406)	-1.371 (2.998)	1.143 (2.498)

注：所有回归均采用 CCT 标准计算的最优带宽；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三）异质性分析

本节分别从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流动状况这些被学术界、政府和社会重点关注的方面对流动人口家庭进行分组回归，考察公租房政策对流动人口超时劳动的异质性影响。这些异质性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值得深入考察。

#### 1. 受教育水平

通常来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个体或家庭的就业决策，并对其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王卫东等，2020）。本文根据被访者是否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将样本分为受教育水平较低和较高两组，然后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公租房政策使得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家庭的超时劳动概率和程度显著下降，但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影响不显著，说明公租房政策对超时劳动的缓解作用并未体现在较高学历家庭。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进城务工的目的是以增加收入为主，且长期收入预期较低，因此，当该群体因获得住房保障使其住房压力得以缓解时，其闲暇偏好得到增强，也就更加倾向在预期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劳动时间以降低工作压力。相反，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更大的收入潜力和职业发展前景，所以在住房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更愿意保持长时间工作以获得长期更高的预期收入，实现留城的远景目标<sup>①</sup>。

<sup>①</sup> 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增长预期会提高（陈至发，2021），也带来了更强的居留意愿（冯承才，2022；史清华、周颖萱，2022）。

表 7 异质性分析：受教育水平

分组	标准误处理	是否 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 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 超时劳动	超时 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 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 劳动程度
初中及 以下	常规标准误	-0.806 *** (0.265)	-0.476 (0.437)	0.005 (0.336)	-0.628 * (0.330)	-0.552 * (0.291)	-0.460 * (0.242)
	纠偏 稳健标准误	-0.841 *** (0.265)	-0.437 (0.437)	0.081 (0.336)	-0.617 * (0.330)	-0.543 * (0.291)	-0.452 * (0.242)
	稳健标准误	-0.841 *** (0.302)	-0.437 (0.521)	0.081 (0.414)	-0.617 * (0.344)	-0.543 * (0.302)	-0.452 * (0.252)
高中及 以上	常规标准误	-0.136 (0.385)	-0.885 (0.617)	-0.140 (0.371)	-0.202 (0.229)	-0.178 (0.201)	-0.148 (0.168)
	纠偏 稳健标准误	-0.140 (0.385)	-0.932 (0.617)	-0.155 (0.371)	-0.191 (0.229)	-0.168 (0.201)	-0.140 (0.168)
	稳健标准误	-0.140 (0.463)	-0.932 (0.734)	-0.155 (0.449)	-0.191 (0.276)	-0.168 (0.243)	-0.140 (0.202)

注：所有回归均采用 CCT 标准计算的最优带宽；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2. 户主年龄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就业行为决策在不同年龄阶段存在显著差异（Begley & Chan, 2018; Zhao et al., 2018）。参考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家庭消费的文献（李晓嘉、蒋承, 2014），本文将被访者按照年龄是否超过 30 岁分成较小年龄和较大年龄两组，然后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针对年轻群体样本的回归系数估计值皆为负，且大部分结果在统计上显著，但针对年龄较大样本的回归系数均未表现出显著性特征。这意味着公租房政策产生的超时劳动缓解效应主要体现在年轻群体中，而对年龄较大群体就业质量提升的积极影响有限。出现上述异质性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不确定性风险的预防性储蓄需求增加（李婧、许晨辰, 2020），因此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工作上以获取更加稳定的收入。相反，年轻人在家庭基本支出有限的情况下，对于预防性储蓄的需求较小，因此在住房压力得以保障时，更可能减少劳动时长。上述结果表明，相比于年龄较大家庭，公租房政策对年轻流动人口超时劳动的缓解作用更加显著，这对于地方政府通过保障性住房政策缓解年轻劳动力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表 8 异质性分析：年龄

分组	标准误处理	是否 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 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 超时劳动	超时 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 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 劳动程度
30 岁 以下	常规标准误	-0.884 ** (0.359)	-0.986 ** (0.411)	-0.446 (0.604)	-0.661 ** (0.288)	-0.582 ** (0.253)	-0.485 ** (0.211)
	纠偏稳健 标准误	-0.865 ** (0.359)	-0.942 ** (0.411)	-0.474 (0.604)	-0.677 ** (0.288)	-0.596 ** (0.253)	-0.496 ** (0.211)
	稳健标准误	-0.865 ** (0.396)	-0.942 ** (0.456)	-0.474 (0.675)	-0.677 ** (0.315)	-0.596 ** (0.278)	-0.496 ** (0.231)
30 岁及 以上	常规标准误	-0.026 (0.342)	-0.285 (0.559)	0.608 (0.551)	0.224 (0.244)	-0.197 (0.215)	-0.164 (0.179)
	纠偏稳健 标准误	-0.038 (0.342)	-0.303 (0.559)	0.766 (0.551)	0.209 (0.244)	-0.184 (0.215)	-0.153 (0.179)
	稳健标准误	-0.038 (0.409)	-0.303 (0.675)	0.766 (0.503)	0.209 (0.274)	-0.184 (0.241)	-0.153 (0.201)

注：所有回归均采用 CCT 标准计算的最优带宽；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3. 流动状况

户籍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决策和工资待遇的重要因素（夏怡然、陆铭，2015）。根据问卷中提供的流动范围信息，本文将受访者按照流动范围分为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两组，然后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

从影响结果来看，公租房政策使得省内流动人口的超时劳动概率及程度有所下降，且在统计上表现出较好的显著性。而对于跨省流动的家庭，公租房政策对其超时劳动虽然也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相比较，住房保障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加友好，可能的原因包括两方面。第一，户籍制度限制改变了家庭经济行为决策的约束条件，使其外出就业成本更高（赵海涛等，2020），所以对跨省流动的非户籍流动人口而言，尽管公租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补偿，但仍不足以抵消户籍制度限制造成的务工成本。第二，户籍制度的另一层内涵是家庭经济福利，省内户籍流动群体获得均等公共服务的概率更高（李尧，2020），所以通过获得更高收入弥补公共资源损失的动机有限，即公租房提供的收入补偿效应更可能使其减少劳动时长。然而，对非户籍跨省流动人口而言，在户籍限制下难以获得本地公共福利，即便获得了住房保障使其

家庭绝对收入增加，但仍需要增加预期收入支付因制度约束而难以获得的公共资源。因此，公租房政策对其过度劳动的影响有限。

综合表 9 的结果，公租房政策对于缓解省内流动人口就业压力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于跨省流动人口的作用相对有限。这对于地方政府降低住房保障政策的户籍门槛和提高异地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

表 9 异质性分析：流动状况

分组	标准误处理	是否 超时劳动	是否过度 超时劳动	是否重度 超时劳动	超时 劳动程度	过度超时 劳动程度	重度超时 劳动程度
省内	常规标准误	-0.407 ** (0.207)	-0.447 (0.397)	0.053 (0.290)	-0.380 ** (0.193)	-0.334 ** (0.170)	-0.278 ** (0.141)
	纠偏稳健 标准误	-0.442 ** (0.207)	-0.463 (0.397)	0.077 (0.290)	-0.395 ** (0.193)	-0.348 ** (0.170)	-0.290 ** (0.141)
	稳健标准误	-0.442 ** (0.215)	-0.463 (0.366)	0.077 (0.365)	-0.395 * (0.210)	-0.348 * (0.184)	-0.290 * (0.154)
跨省	常规标准误	-0.349 (0.966)	-0.674 (1.185)	-0.631 (0.788)	-0.549 (0.434)	-0.483 (0.382)	-0.402 (0.318)
	纠偏稳健 标准误	-0.032 (0.966)	-0.979 (1.185)	-0.604 (0.788)	-0.623 (0.434)	-0.549 (0.382)	-0.457 (0.318)
	稳健标准误	-0.032 (1.118)	-0.979 (1.358)	-0.604 (0.959)	-0.623 (0.508)	-0.549 (0.447)	-0.457 (0.372)

注：所有回归均采用 CCT 标准计算的最优带宽；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五 一个经典问题的讨论：“福利陷阱”

本文之前的分析证实，公租房政策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过度劳动的被动工作行为。那么，为什么公租房政策的保障机制并未转化为外来人口长期留在城市的意愿？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长得以减少的原因是否源于住房保障给予的货币支持？还是为获得住房支持而“有意”降低劳动偏好？理论上，公租房政策的货币补贴缓解了流动人口的就业压力，使其降低通过超时劳动获得更高收入的概率。但同时，如果公

租房政策带有“福利陷阱”特征<sup>①</sup>，即受保障群体为继续获得公租房保障而降低劳动偏好，使其收入稳定在公租房申请的收入标准之下而继续获得租赁补贴资格；按此逻辑，公租房政策的货币支持机制并未发挥作用，相反，“福利陷阱”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劳动积极性，而且难以改变劳动力流失问题。更重要的是，以政府为主导、财政支出为支撑的公租房政策会因此损害经济效率和长期福利保障。

尽管该情况并非公租房政策的设计初衷，也不符合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参照发达国家社会福利保障经验，公租房政策确实存在“福利陷阱”的可能。特别地，如果公租房政策存在“养懒汉”情况，那么公租房政策既加大了政府财政压力，从长期来看易出现“福利刚性”特征，继而抑制经济效率，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受保障群体长期福利的获得。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尝试探索中国公租房政策是否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国家出现的过高福利情况，以期为公租房政策的改革调整提供理论参考。我们参考范合君等（2022）、贾男（2020）的研究，将正常工作状态和工作积极性作为被解释变量，间接检验住房保障对受保障群体的补贴是否存在“福利陷阱”。其中，采用问卷中“每周是否工作 5 天”衡量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采用问卷中“是否参加公益、党团、社区或行政反馈等”衡量工作积极性。

根据表 10 的结果，正常工作和工作积极性模型中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流动人口并未因住房保障支持而改变正常工作状态或降低工作积极性。该结果间接说明流动人口没有因住房保障产生的货币补贴而陷入“福利陷阱”，也佐证了对超时劳动缓解主要源于住房补贴产生的收入效应。

表 10 公租房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

变量	双边相同带宽		双边不同带宽	
	正常工作	工作积极性	正常工作	工作积极性
常规标准误	-0.728 (0.726)	0.011 (0.012)	-0.972 (1.763)	0.016 (0.016)
纠偏稳健标准误	-0.795 (0.726)	0.004 (0.012)	-0.743 (1.763)	0.003 (0.016)

<sup>①</sup> “福利陷阱”指的是政府为了维持短期福利水平不至于下降，牺牲长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福利水平（黄少安等，2018）。

续表

变量	双边相同带宽		双边不同带宽	
	正常工作	工作积极性	正常工作	工作积极性
稳健标准误	-0.795 (0.894)	0.004 (0.007)	-0.743 (2.148)	0.003 (0.010)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计算得到。

## 六 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举措，这不仅关乎民生和社会和谐发展，而且对于稳就业、保就业和促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前期国家重点推进的公租房政策保障逻辑，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公租房政策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公租房政策对流动人口超时劳动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体现了住房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的正向作用，但并未因此降低流动人口流出本地的预期；第二，上述政策效果对受教育水平较低、年轻和省内流动等群组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三，中国公租房政策并未表现出“福利陷阱”特征，过度劳动得以缓解的主要原因在于住房保障政策给予的货币补贴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家庭净收入。以上研究结论对优化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政策以及释放流动人口有效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启示，也为“十四五”期间保障流动人口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加快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降低流动人口获取住房保障的收入门槛。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特别是青年人才的集聚至为关键，但当前仍处高位的住房成本抑制了大城市人力资源供给。在此背景下，租房补贴的住房保障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大城市进一步降低租赁保障的收入门槛，针对重点产业亟需的人才叠加更大力度的保障，最大程度发挥公租房政策的家庭补偿性收入的积极作用，缓解流动人口过度劳动和人力资本流失问题。

第二，防止西方国家出现的“福利陷阱”问题。建议针对不同收入流动人口采取具有差异性的货币补贴措施。尽管中国公租房政策的“福利陷阱”尚未出现，但应做好规避方案，比如对受保障群体根据收入进行分档，对收入较低的住房需求群体，提供力度较大的租金补贴；适当减少针对中间收入档群体的租金补贴，充分发挥公租房

政策的货币激励作用。

第三，扩大保障房供给，加速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考虑到租赁保障对流动人口超时劳动产生了积极的缓解效应，建议人口流入型城市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规模，充分利用好存量公租房、存量商办，并有效发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积极作用，让更多流动人口的住房得以兜底，使其更好地服务大城市发展。

第四，提升对流动人口中弱势群体的住房补贴力度。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低教育水平、年轻和省内流动的群组受住房保障的货币激励效果更加明显。这些一致性结论提示我们，住房保障制度的优化调整更应关注到该部分弱势群体的实际利益，针对性地提高附加保障措施的力度，从而优化城市经济发展所需人才资源的结构。

第五，叠加其他维度的公共福利，凸显住房保障对流动人口健康就业的全方位积极影响。流动人口在医疗、教育、劳动权益保护和养老等维度的公共资源短缺也会使其物质生活水平降低，特别是一些保障房远离就业地点、公共资源集聚地或轨道交通，由此产生的职住失衡、空间错配等问题也会降低保障房的福利效应。因此，建议围绕保障房对流动人口的福利贡献，配套其他资源保障，进一步巩固流动人口获得住房保障的正外部性。

## 参考文献：

- 陈立中、邓保同（2015），《保增长与惠民生能否兼得：以住房保障的经济拉动效应为例》，《财政研究》第 12 期，第 30-36 页。
- 陈至发（2021），《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研究——基于浙江省 2020 份问卷数据》，《调研世界》第 8 期，第 19-26 页。
- 崔光灿、廖雪婷（2018），《产权支持与租赁补贴：两种住房保障政策的效果检验》，《公共行政评论》第 2 期，第 20-35 页。
- 邓红平、罗俊（2016），《不完全信息下公共租赁住房匹配机制——基于偏好表达策略的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 10 期，第 168-182 页。
- 邓睿、郭东杰（2022），《居住空间分异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考察》，《浙江学刊》第 4 期，第 94-107 页。
- 范合君、吴婷、何思锦（2022），《“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 境? ——基于互动治理的视角》，《管理世界》第10期，第126-153页。
- 封世蓝、谭娅、蒋承（2019），《家庭社会网络与就业质量——基于2009-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的分析》，《金融研究》第10期，第79-97页。
- 冯承才（2022），《新生代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上海市新生代流动青年的考察》，《青年研究》第5期，第81-93页。
- 胡放之（2014），《保障住房、增加就业与改善民生的可持续性——以湖北黄石棚户区改造为例》，《理论月刊》第12期，第147-151页。
- 黄少安、陈言、李睿（2018），《福利刚性、公共支出结构与福利陷阱》，《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90-113页。
- 贾男（2020），《老龄化背景下退休对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统计研究》第4期，第46-58页。
- 李婧、许晨辰（2020），《家庭规划对储蓄的影响：“生命周期”效应还是“预防性储蓄”效应？》，《经济学动态》第8期，第20-36页。
- 李礼连、程名望、张珩（2022），《公共就业服务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吗？》，《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第134-152页。
- 李晓嘉、蒋承（2014），《我国农村家庭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金融研究》第9期，第115-127页。
- 李尧（2020），《教育公共服务、户籍歧视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财政研究》第6期，第92-104页。
- 李勇辉、李小琴、沈波澜（2019），《安居才能团聚？——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推动效应研究》，《财经研究》第12期，第32-45页。
- 凌琬（2022），《就业质量与居民主观福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第10期，第149-160页。
- 卢文秀、吴方卫（2023），《患寡亦患不均：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民工过度劳动》，《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第100-123页。
- 毛丰付、王建生（2016），《保障性住房能够促进人口流动吗？——基于省际人口流动的引力模型分析》，《华东经济管理》第11期，第86-95页。
- 毛宇飞、胡文馨（2020），《人工智能应用对人力资源从业者就业质量的影响》，《经济管理》第11期，第92-108页。
- 米松华、李宝值、朱奇彪（2016），《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兼论维度差异与城乡差异》，《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第42-53页。



- 史清华、周颖萱 (2022),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第 69-84 页。
- 孙伟增、张思思 (2022), 《房租上涨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与社会融入——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 (季刊)》第 1 期, 第 153-174 页。
- 万广华、张琰 (2021), 《信息与城市化——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 (季刊)》第 2 期, 第 465-492 页。
- 王卫东、白云丽、罗仁福、张林秀 (2020),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 《经济经纬》第 5 期, 第 37-44 页。
- 夏怡然、陆铭 (2015), 《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 《管理世界》第 10 期, 第 78-90 页。
- 徐俊杰、陈一飞、钱文豪、王洪卫 (2022), 《房租负担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公共服务可及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财贸研究》第 1 期, 第 26-39 页。
- 叶文平、李新春、陈强远 (2018), 《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机制与证据》, 《经济研究》第 6 期, 第 157-170 页。
- 张莉、何晶、马润泓 (2017), 《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 《经济研究》第 8 期, 第 155-170 页。
- 张琪 (2015), 《保障房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研究: 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 《社会科学战线》第 6 期, 第 68-73 页。
- 张世伟、张君凯 (2022), 《技能培训、工作转换与就业质量》, 《劳动经济研究》第 1 期, 第 3-29 页。
- 张樾樾、王利华 (2017), 《“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第 116-130 页。
- 赵海涛、常进雄、付卓婧 (2020), 《家庭视角下农村居民非农劳动供给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第 5 期, 第 53-71 页。
- 诸萍 (2021), 《子女随迁对流动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差异视角》, 《南方人口》第 3 期, 第 41-55 页。
- 祝仲坤 (2020), 《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中国农村观察》第 5 期, 第 108-130 页。
- 踪程 (2020),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问题》第 1 期, 第 112-122 页。

- 邹旭、马贤磊、石晓平 (2021), 《保障性住房供应如何影响商品房价——挤出供给抑或分流需求?》, 《财经研究》第 11 期, 第 49 – 63 页。
- Begley, Jaclene & Sewin Chan (2018). The Effect of Housing Wealth Shocks on Work and Retirement Decision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73, 180 – 195.
- Calonico, Sebastian, Matias Cattaneo, Max Farrell & Rocío Titiunik (2019).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Using Covari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1 (3), 442 – 451.
- DiPasquale, Denise & Michael Murray (2017). The Shifting Demand for Housing by American Renters and Its Impact on Household Budgets: 1940 – 2010.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7 (1), 3 – 27.
- Jacob, Brian & Jens Ludwig (2012). The Effects of Housing Assistance on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 Voucher Lotte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1), 272 – 304.
- Moffitt, Robert (1992).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U. S. Welfare System: A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0 (1), 1 – 61.
- Sinai, Todd & Joel Waldfoegel (2005). Do Low-income Housing Subsidies Increase the Occupied Housing Stock?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11), 2137 – 2164.
- Zhao, Jianmei, Lin Liu & Ruihan Liu (2018). How House Price Appreciation Affects Homeowners'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6 (2), 233 – 252.

## **Housing Security Systems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s: An Analysis Using a 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Based on the Access Conditions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Wang Shiyong<sup>1</sup>, Wan Guanghua<sup>2</sup>, Sun Weizeng<sup>3</sup> & Wang Hongwei<sup>1</sup>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up>1</sup>;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sup>2</sup>;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up>3</sup>)

**Abstract:** Improving the housing conditions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s is crucial for promo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building a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 This article

employs a 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based on the access conditions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data from 2016 and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significantly reduces overtime labor supply among migrants, both in terms of probability and degree. However, the migration expectation remains unchanged. Furthermore, the improvement in job quality resulting from the public housing policy is more pronounced for individuals with lower education, the youth, and those migrating within the province. Importantly,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policy does not lead to a “welfare trap” dilemma; meanwhile, the increase in compensatory family income is found to underlie the improvement in employment quality among migrants.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contributing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mployment-stabilizing role of t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affordable housing.

**Keywords:** migrant, public rental housing, employment quality, migration expect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22, J61, H55, R31

(责任编辑: 西 贝)